

辞书研究

1

1981

C
I
S
H
U
Y
A
N
J
I
U

辞书研究

1981 年第一期

(总第七期)

1	陈翰伯	肩负起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4	罗竹凤	《汉语大词典》在实践中	101
13	张履祥	语文辞典释义初探	50
25	金文明	哪些方面有所出新	
33	王 涛	谈书证	
44	骆伟里	谈相关条目的处理	
48	钱剑夫	“古今兼收,源流并重”随想	
53	[附]	《汉语大词典》初稿选刊	
64	熊效孟	《新华字典》编写上的几个特色	
69	刘韵玲	不怕“四不象”,但求能实用 ——《汉语小词典》编写上的一点尝试	
74	陈羽纶	《英汉小词典》的编写	
80	周行健	周荔裳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简评	
86	卢润祥	关于《唐宋词常用语释例》	
87	徐 青	词的语义域和词典	
98	符淮青	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	
111	穆武祥 编译	语言环境中的词和词典条目中的词	
113	徐志仁 译	词典的词汇	
120	文 祥 编译	词汇学范畴在词典中的相对性	
124	高 森 编译	为普通语词词典挑选术语词汇	

132	维 仁 ^译	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
134	祝注先	准确释义漫谈
41	汪耀楠	大型辞书注疏材料的运用
151	陆丙甫	动词名词兼类问题
156	田光明	普通话“清入”的归调问题
	亦 志 ^译	词典的服务对象
	于琼沙 ^{编译}	双语词典编纂中的若干问题
	张娟云	谈谈双语词典中的缩略词
80	郭育英 ^{编译}	教学词典的特点和类型
184	王德春	反映时代脉搏的词典
190	苏延宾 林飘凉	《纺织辞典》的编纂要求
198	郭长生 黄志学	《化工辞典》的编辑
201	杨关林	编写中的《中国名胜词典》
206	[附]	《中国名胜词典》初稿选刊
214	黄长著 卫志强 林书武 周绍珩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评介
222	卢中岳	《图书馆学辞典》再评价
229	张涤华	读新版《辞海》偶识
233	潘 征	希望有逆序式汉语词典
235	郑述谱	有一本国际词素词曲就好了
236	晓 津	多讲究点实用性
238	甘于恩	析“再”
241	孔祥群	还是“夜以继日”好
242	周 干	请考虑减少查字的周折

244	蔡声鏞 《尔雅》与百科全书
260	斯英琦 编译 《尔雅》的意义和性质
267	阿 祥 许慎的生平和思想
271	唐尚斌 阿西莫夫和他的《科技人名百科词典》
275	周继武 博引旁证之本〔辞书文摘〕
279	方厚枢 建国三十年来出版辞书编目(续四)
辞 书 之 窗	北美词典学会会刊小介(12)西德出版《自然界大百科词典》(12)香港出版《李氏中文字典》(24)英国的《未知数百科全书》(24)英国将出版两种百科全书(73)两种美术工具书出版(73)一部解释南斯拉夫自治制的百科全书(97)美国出版《商品名词典:公司索引》(97)商务印书馆出版《国际时事辞典》(155)两部新型诗词鉴赏辞典积极组稿(183)德英辞典工作者合作编出双语图解词典(197)美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205)美国政府编印我国地名词典(213)柯林斯出版最新英语综合词典(228)

辞书研究 第一期

1981年2月

编辑者: 辞书研究编辑部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出版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市期刊登记证第29号 书号 17187·46 每册定价 0.75元

《汉语大词典》专辑

肩负起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国家出版局代局长 陈翰伯

《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

五个年头在历史上是极其短暂的一瞬。然而,在这期间,我们却经历了历史转入新时期的深刻变化。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并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提出十年编写一百六十种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8月,当时已是重病在身的周总理,在医院里亲自批发了这个报告。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批示的有关出版工作的最后一个文件(即国务院〔1975〕137号文件)。9月,我们在上海召开了由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出版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的研究编纂《汉语大词典》的协作会议,成立了编写领导小组及其设在上海的办公室。随后,建立了一批编写据点,不久福建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承担这一任务的五省一市的辞书工作者、部分高校和中学教师,欢欣鼓舞,精神抖擞,志愿为完成我们党和人民所期望的这部大词典的编纂出版任务作出贡献。但是,在这之后的一年间,我们遭遇了“四人帮”最猖獗横行时期的困难。“四人帮”及其一伙反对“搞那么

多词典”，胡说这是“刮业务台风”而加以阻挠破坏，对他们诬蔑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继续进行种种迫害；不仅如此，当时的困难还在于“四人帮”按其反革命的需要而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扩散的极“左”思想，对于我们的思想和认识有一定的影响。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带领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道路。当然，“四人帮”对我们国家的十年的干扰破坏太严重了，文教战线尤甚，可以说是十年浩劫，后果极其严重，影响也有所延续，就象刹了闸的车子还会滑行一小段路一样，它有个惯性，我们因此还有个复苏的过程和肃清流毒的工作。但总的说来，“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汉语大词典》工作存在的一些困难，主要是限于当前的主客观条件而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教学工作和辞典工作都需要专业人员的矛盾，词典工作的长期性和编纂人员临时性的矛盾，此外，还有资料问题，经费问题，排印、纸张问题，等等。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9月、1978年9月，我们先后在青岛和黄山召开了人数较多的编写工作会议，1979年5月，我们就加强五省一市《汉语大词典》的工作和在上海成立编纂处的问题，专门向中宣部写了报告，中宣部很快作了“原则同意，请努力进行”的批示，于是我们立即在苏州东山召开了编写领导小组的一些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贯彻中宣部的批示。这些会议，有步骤和有成效地解决了一些认识和实际问题。随即，五省一市积极开展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1979年9月，《汉语大词典》编委会正式成立，并在苏州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汉语大词典》的工作在稳步前进。在我们前面肯定还有有待不断克服的困难，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走上了能够较为顺利实现我们肩负的重大任务的坦途。《汉语大词典》草创那时，“四人帮”在台上，我们有“寸步难行”之感，而今我们恰恰先印出了“寸部”的初稿本，用同志们的话来说，现在是“寸部(步)先行”了——这可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预示着我们的工作将大步前进。

《汉语大词典》预定于1985年出版。当我们在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瞻望前程的时候，我们满怀积极的乐观的信念。在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过程中，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的词典工作者，充分感受到任务的光荣。我们伟大民族在文化历史上是最初向人类提供辞书的民族。《尔雅》及其后继的众多辞书，标志着它们产生的各个时代我们祖国的文化水平，辉煌于世界历史。在当代，我们的辞书事业显得落后了。改变落后局面，并创造性地开展社会主义辞书事业的任务，现实地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也感受到自己任务的艰巨。一部《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按其内在的必然性将是自远古到现今几千年来我们民族语言文字的总集。我们为此须得从大量庞杂的古今文献资料掘发收词对象，须得尽力探索词语的源流和演变，并给与科学的精当的释义，以便为读者排解阅读文史著作中遇到的语词方面的困难。要编好一部《汉语大词典》，不付出艰巨的劳动是不行的。

我们一定要完成我们的任务，也一定能够完成我们的任务。兄弟词典，经历二十年艰难曲折的《辞海》合订本正式出版，《辞源》以分册的形式在陆续出版中，这既是一种鼓舞的力量，也是我们任务定能完成的先例。我们的辞书事业，是我们党的、社会主义的事业，因而总是能够吸引全国专家学者和国际进步文化人士的关怀和支持。在党的领导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以实际行动检验真理、认识和发展真理的持续过程中，切实解放思想，我们就能明确和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就能不断锤炼和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就能拓展我们知识的视野，驾驭事物的客观规律，胜利完成我们的任务。让我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努力进行《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踏踏实实地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我们的贡献。

《汉语大词典》在实践中

《汉语大词典》主编 罗竹风

一、为“四化”添砖加瓦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如果不是这样，地球可能更早地出现沙漠化的现象，人类生活将濒临绝境。文化科学需要长期积累，往往是在前人辛勤劳动的基础上，添砖加瓦，才能继续建设起更高的大厦。

中华民族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民族，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人类文化发祥地之一。只是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在许多方面才落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各项工作都在蓬勃发展，科学文化也有很大进步。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科学文化事业遭受到严重摧残，不止后退了二、三十年。粉碎万恶的“四人帮”以后，人民第二次得到解放，科学文化也得以长足进步。

党的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这是非常必要，完全正确的。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化”，极大地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就成为迫切的需要了。不能够设想，操纵现代化的设备，运用电子计算机，没有相应的科学知识就可以胜任；也不能够设想，用管理小生产的一套办法能够搞好现代化的大企业。知识就是力量，落后就要受穷挨打，这是现实生活中所再三

证明了的，难道还有什么怀疑的余地么？

书籍是打开知识宝库之门的钥匙。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因而书籍的出版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辞书和工具书担负着一种特殊任务，为解决人们日常学习和工作中随时遇到的疑难问题提供方便；只要翻一翻，查一查，便可手到擒来，豁然开朗，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人们把百科全书称之为“知识总汇”，是有道理的；而把辞书和工具书比作“良师益友”，也是从实践中所得出来的结论。

单就辞书而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的，一类是专业性的。为了分别满足不同读者对象查考的需要，综合性的也好，专业性的也好，又可以有大型、中型、小型三种。综合性的辞书给予读者一般知识，面广而不深；专业性辞书给予读者某一学科的专门知识，要求详尽而有深度。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四化”，需要阅读更多的书籍，具有更高的表达能力。中国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书籍文物浩如烟海，我们不仅要了解现在，还得了解过去；现在是过去的继续，一脉相承，割不断理还乱。这样，就自然发生了一个批判地继承遗产的问题。要整理和弄通过去的文献资料，为我所用，语言文字是座桥梁。中国过去大量的文字、音韵、训诂著作，《尔雅》、《方言》、《说文》、《广韵》以至于《康熙字典》、《辞源》、《中华大字典》、《辞通》、《辞海》，等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编写的。不管是什么人，只有当他充分掌握了语文工具，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才能结合自己的专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编纂《汉语大词典》，这是为了实现“四化”的需要，为了极大地提高中国人民文化水平的需要，是我们应该完成的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它预定收词约三十余万条，属于提高性质的大型语文词典。通过对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整理，为研究汉语词汇学提供资料，同时也可以帮助解决阅读古今图书时所遇到的问题，扫除因词

语难懂所造成的困惑。新编一部具有时代特色的《汉语大词典》，这是迫切需要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人类也正是这样不断前进的。

为了在语言文字方面，把前人研究的成果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为了追溯和探索现代汉语的源流；为了尽可能地丰富人们的语汇；很有必要编纂《汉语大词典》这样一部专业性的、提高的、大型的工具书。另外，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还有一部分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得以幸存，他们精通业务，是骨干力量，再由更多的中青年语文研究工作者配搭起来，大家同心同德，协力合作，共同担负起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便可以把《汉语大词典》编好。如果现在不立即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蹉跎岁月，再推迟若干年，人力一定更少，困难一定更多，必然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及早地把《汉语大词典》编纂出版，的确是时代的召唤，是向“四化”进军的需要。

二、勾划一个粗略的轮廓

由中央教育部、国家出版局发起编写的有两部大型语文词典：一部是专收单字的《汉语大字典》，由四川、湖北两省协作编写；一部是专收词语的《汉语大词典》，由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五省一市协作编写。两部大型语文词典，起步差不多，编成的时间也差不多，都要求在1985年左右正式出版。

《汉语大字典》计划收字约六万个，只要是汉字，不管“死活”，一律收进。《汉语大词典》预计收字二万多。除一般书证外，凡见于《尔雅》、《方言》、《说文》、《广韵》所收集的字都准备收进去。《广韵》一书，仅收字二万六千余。如果扩展到《集韵》，则须收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个，比《广韵》倍增，这只好让《汉语大字典》去承担了。《汉语大词典》所收的二万多字，也就包括在《汉语大字典》六万字的范围之内。

中国文字就其应用频率来说，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常用字；二是冷僻字；三是死字。常用字所带的词语多，义项也多；冷僻字的词语较少，义项也相应减少。至于死字，或形存义亡，或只有字形而音义都无从探索，根本无词语附着。《汉语大词典》既以收词为主，过于冷僻或者已经死去的字，就没有必要去收了。

1979年9月，编委会在苏州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明确了“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编写方针。尽可能收录古今汉语著作中的普通词语，吸收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准确地解释词义，恰当地引用书证，以古为主，兼及现代，力求反映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所谓“古今兼收”，就是要突破时代的界限，对古今汉语词汇兼收并蓄，尽量做到完备。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古比今长，而今又是从古演变过来的。语言文字的继承关系非常明显，它没有什么阶级性，而是由人们作为共同的交际手段记录流传下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积月累，新旧交迭，必然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繁多。但源远流长，以今视古，也往往产生扑朔迷离，难以理解的困难。因此，从历史上加以探索，正本清源，便可以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一个词汇的涵义。这不一定是大多数人的要求，但是对于专门研究文、史、哲的人，却不能不说是非常必要的。《汉语大词典》正是为这些人服务的，这是由它的提高性质所决定，区别于一般中型和小型语文词典所应承担的任务。

以古为主，兼及现代，是仅就历史而言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表现在书面范围以内的汉语词汇，若从鸦片战争断代，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四十年；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仅仅几十年。从数量上计算，古汉语词语占多数，这是理所当然的。一到现代，纵横交错，汉语词语就形成了一个汪洋大海，而且丰富多采。因此“古今兼收”，绝不能理解为厚今薄古，以至忽视现代。

《汉语大词典》按照辞书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用绝大部分篇幅专收语词条目，使它成为一部具有自己特色的语文词典，以区别于

语词、百科兼顾的《辞海》这样类型的综合性词典,更不用说其他那些不收语词的专业辞书了。大词典,也不能只着眼一个“大”字,专以数量取胜,认为包揽、搜集得越多越好,象《大汉和词典》、《中文大辞典》那样,把一些不成词的短语都收罗进去,重量不重质,是不足为训的。因此,收词原则的确立,是提高辞书质量的前提,越是谨严,质量必然越会提高;即使词目少一些,也无所谓。

收词原则一般应当是约定俗成,不能生搬硬套。凡不成词的一律不收。汉字的特点是单音节。词语的构成,有的一个单音节汉字(词素),便可构成一个独立的词,例如“茶”、“水”、“人”、“去”、“来”、“走”等等,词汇学把它叫做单纯词,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单音词。但汉语更多的却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构成的合成词,也叫复合词或复音词。这些汉语中的基本单位,作为语言的材料,实词再加上必要的虚词,可以构成表达一个完整概念的句子,许多句子有规律地连接起来,就变成思想的符号和外衣了,于是人们赖以交际的语言功能就形成了。

除单词、复词之外,还要吸收成语、典故及其变化形式。成语是一种习用而又定型的词组或短句,多数由四个字组成;有的从字面上即可看懂,如“千紫万红”、“雷霆万钧”等等;有的属于典故范围,是有所本,见之于前人著述而加以提炼的,如“守株待兔”、“饮鸩止渴”、“愚公移山”等等。成语典故,有许多属于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总结或概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增强语言色彩和渲染语言环境,起很重要的作用。成语典故的变化形式,是针对四字组成的常用形式而言的。现有的语文词典有一个较大的缺陷,就是只收成语典故的常用形式,而忽视其变化形式。例如1979年版的《辞海》收了“洛阳纸贵”和“南柯”两条成语典故,却不收“纸贵洛阳”和“蚁梦”、“槐安梦”、“梦觉大槐”等变化形式。这样,就会增加读者因成语典故的变化而无从查考的困难。《汉语大词典》既然是大型的词典,为求其完备,一定要增收这些成语典故的变化形式,作为参见

条或附条,指明应查哪一主条,这样就会为读者提供许多方便。

汉语词语,有单义词,但大量的还是多义词,就是说一个词语有许多意义。多义词应当按义项分列,由此看出其历史演变过程,一般说,以按照古今先后排列为宜。在词目(词头)选收之后,需要用简要的文字把它解释交待清楚;而为了要解释清楚不同的义项,除文字说明之外,还必须引用恰当的书证。有的义项书证多,有的义项书证少甚至于是孤证,这也是必然的。对于孤证,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本来如此;二是由于功夫不到家,还没有查到更多的材料。不管怎样,绝不能得出只要是孤证,质量就低的结论来。引用书证印证释文,是为了懂得怎样应用,加深对词目和义项的理解。因此,引用书证,一定要确切恰当,不能牵强附会,更不能张冠李戴。编委会曾有明文规定:书证不能只根据第二手资料,必须查对原书,以免以讹传讹,造成不良后果。《汉语大词典》着手编写不久,经过核对资料,就已发现《大汉和词典》和《中文大辞典》在这一方面是很有一些缺陷的。我们要力求在资料、书证工作上做到家,踏踏实实,一字不苟。这也是提高质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千万忽略不得的。

从总体上来说,要真正提高质量,资料积累必须充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离开了足够的资料从事辞书编写工作,只能是凭主观臆断,不说空话,就说废话,必然弄得面目全非。不妨这么说,资料增一分,质量就可能高一分。因此,《汉语大词典》的编写过程,也是不断积累资料的过程。水涨船高,资料越多,如果善于抉择,写出来的条目质量也就越高。有的资料,我们看到了,应用了,这样肯定会比人家略胜一筹,写出来的东西就比较高明。资料与论点相一致,自然会产生高质量。《汉语大词典》开始编写以来,已经积累了几百万张卡片,而且在编写过程中,还要继续积累更多的卡片。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财富,为提高大词典的质量而努力。

伴随着四个现代化而来的,要想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

文化水平，需要编写出版各式各样的辞书和工具书。现在辞书、工具书的春天已经到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比较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编写辞书和工具书了，一支编写队伍也正在形成中。通过《汉语大词典》的编写过程，可以培养一支具有一定业务水平和从实践中不断提高的编写队伍，其中除老专家以外，一批中青年语文工作者也正在成长。这支编写队伍不仅用于一时，而且还可以作“持久战”，承担辞书和工具书的长远编写任务。

为了不断更新这支队伍，还可以在综合性大学设置专业，与辞书、工具书编写出版单位，对口挂钩。这样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提高，以便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多快好省地培养出新生力量和接班人，为繁荣祖国的辞书、工具书出版事业而奋斗。

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编写《汉语大词典》这样大部头、高质量的语文专业词典，究竟是由一个研究单位独家经营好呢，还是铺得更广些，组织更多的力量编写好？成败利弊还有待今后的实践去证明。但有一条原则是应当肯定的，这就是必须充分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于优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也有待于实践去检验。

《汉语大词典》由五省一市协作编写，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发挥广大语文工作者的才智和积极性，相互鼓励，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时还可以出现你追我赶、人人争先这样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动活泼局面。浙江省写出“寸”字部以后，江苏省紧跟着写出了“谷”字部和“齊”字部，上海也写出了“羊”字部，山东、福建、安徽也正在努力编写，不久就可以拿出成果来。这样形成了长江后浪催前浪，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好形势。

五省一市协作编写，成立统一的编委会，在确定了收词原则和编写体例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之后，全面部署工作，及时总结和交流经验，大家统一计划，齐一步伐，便可收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建

立一个编辑中心，具体负责组织、联系、协调、推动全面的编写工作，并且也分担一部分审稿和定稿工作。在上海建立《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正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它将承担起日益繁重的编辑业务和后勤工作，更好地为五省一市加紧完成编写任务而服务。分散与统一相结合，以统一制约分散，在分散的基础上集中，分工协作，调度得当，大约可以保障《汉语大词典》及时完成编写和出书任务。

但是也必须看到另外一方面，由五省一市协作编写，战线长，队伍散，问题一定也不会少。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们还缺乏经验，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因而遇到的困难一定是很多的。譬如说，稍有疏忽大意，一个地方掉队了，没有及时完成编写任务，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全局。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化教育战线百废待举，需要加倍努力才能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具有编写大词典能力的同志，往往兼职很多，不能全力以赴，这也是一种实际状况，亟需进一步调整和改进。此外还有各写各的，必然会产生文风不一致，水平高低不齐的问题。如果一开始不认真抓紧，交叉条目处理不好，留待所有的稿子集中起来之后再去做处理，不但工作量太大，而且也必然会影响质量。假如由一家集中承担编写任务，由于指挥灵活，以上问题即使发生，改正起来也比较容易。五省一市分部首编写，“尾大不掉”的现象总是难以避免的。因此，防患于未然，把偏差消灭在萌芽状态，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加以解决，这是五省一市编委会、办公室和所有编写同志必须随时注意的问题。当然，编纂处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

实践出真知。去年夏天，浙江省写出了“寸”字部，我们和《大汉和词典》、《中文大辞典》对比研究，从中分析优点缺点，摸到一些属于规律性的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编写工作。不然，只能是空来空去，不着边际。今年这一年，通过实践，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多的经验，作为指导工作继续前进的依据。在不断实践、不断取得经

验的基础上,争取在1983年完成初稿,1985年正式出书,还是可能的。

《汉语大词典》在实践中,在实践中成长,在实践中提高。只要各地领导重视,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向着这个共同目标前进,我们相信,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就一定能够完成。《汉语大词典》绝不会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全国和全世界辞书之林。

我们恳切希望全国专家、学者和语文工作者,随时予以指教,鞭策我们不断前进。

1980年3月

北美词典学会会刊小介

北美词典学会(Dictionary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出版的会刊有《词典》和《学会通讯》(DSNA Newsletter)两种。

《词典》1979年第1号是由密执安大学英语系理查德·贝利负责编辑的。内容包括《英美词典学精华》、《北美西部词典泛论》、《词典学讲授概观》等十篇论文以及《苏里南荷兰语词典》、《陷入词网中》等六篇书评,计164页。

《学会通讯》1980年春季版由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爱德华·盖茨主编。这一期通讯发表了北美词典学会前任主席沃伦·科德尔和加拿大语言学会创始人沃尔特·阿维斯教授的讣告;报道了1979年下半年有关词典编纂学方面一些讨论会的情况和北美词典学会出版物的消息;介绍了几部正在编纂或即将出版的词典;还有《词典学在印度》、《美国方言词典质疑》等短文及会员动态。《通讯》每年出版两期,篇幅不大(总共才6版)而内容相当充实。(斌)

西德出版《自然界大百科词典》

西德出版了由马尔库斯·维尔姆用德文和意大利文编写的《自然界大百科词典》。这部词典分四卷,共1,568页,收有4,800多个词条和2,000多幅插图,提供了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和保护环境情报。(夏)

语文辞典释义初探

——《汉语大词典》编纂札记

张履祥

一部词典，能否做到准确地释义，是衡量它的科学性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词典编纂中最艰巨的任务。正在编写中的《汉语大词典》，如何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正是我们所有参加编纂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目标。这里，就个人在编写中摸索所得，谈一些体会，以求抛砖引玉，共同探讨。

一

要做到准确地释义，首先须要适当地概括词义，正确地确立义项。

词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运用词的语音形式表达出来的内容概括的反映。概括性，是词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303页）。准确地释义，就是要在综合、分析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一个词所反映的对象共同属性的总和，用准确而又简明的文字作出适当的概括。所谓“适当”，就是要概括得恰到好处，达到内（涵）外（延）相称，观点与材料统一，词义与书证相符，既体现词义的概括特点，又切合书证的具体环境。

词义概括不当，用词素义代替词义，是我们在释义时常犯的通